

论德国统一后的自主性全方位外交

吴友法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吴友法(1948-),男,湖北武穴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德国近现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内容提要] 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欧洲的大国,并彻底摆脱了战败国地位和以美苏为首的四大盟国的控制。德国统一及后来苏联解体,标志着以美苏对峙的“冷战”时代的结束,欧洲力量对比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格局迅速朝多极化方向发展。根据自身地位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德国在外交上改变了以往追随者形象,根据其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开展自主性的全方位外交,极力扩大德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使之成为世界上的政治大国,并以世界大国的身份主动要求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关键词] 统一后德国;自主性外交;全方位外交

[中图分类号] K 5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6-0135-07

德国统一已经快10年了。统一后的德国在外交上有些什么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德国统一后的科尔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总目标是:一方面从经济关系和本国的经济利益出发,努力在国际舞台上为德国谋求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极力扩大德国在政治上的影响,使德国成为一个世界上的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为此,德国在对外关系上的总方针是开展全方位外交,不断扩大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和外交活动空间。

继续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事业,并在欧洲联合中确立德国的主导地位,这是科尔政府在德国统一后外交上的首要任务。

自“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趋势,欧洲无疑是这一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仅从经济因素而言,欧洲与美国已成为竞争对手。因此,德国对外积极推动欧洲的联合和统一,增强欧洲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这对处于欧洲中心的德国自然是大有裨益的。德国统一后的政府声明指出:继续从事欧洲的统

一事业,进一步发展北大西洋联盟,稳定和支持中欧和东欧的改革进程,在联合国认真负责地共同发挥作用以及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科尔将继续从事欧洲统一事业作为他的政府的首要目标。为此,科尔在德国统一后继续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欧洲的联合,把建立“欧洲大厦”作为德国外交的首要任务。

科尔推动欧洲联合要实现的目标是,努力实现欧洲的政治联合,将欧共体发展成为欧洲联盟,然后在欧洲实现统一的货币。为实现这个目标,科尔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方案。方案指出:在1992年12月31日前成立一个拥有3.4亿人口的欧洲内部大市场;建立一个无边界的欧洲,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欧洲,而是一个多样化的欧洲;要使欧洲议会获得更多的权力;要制定一个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实现欧洲的经济和货币联盟,要有一种稳定性不次于德国马克的欧洲货币,成立一家独立的欧洲银行。科尔指出,我们的核心目标现在和将来都是欧洲的政治联合,共同体必须向其他欧洲国家开放;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各国“返回欧洲”,要促使这些国家的改革进程;共同体将成为自由欧洲的结晶点,成为欧洲合众

国的结晶点。科尔认为,德国不想恢复昨天的欧洲;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不取消我们的民族特性的欧洲;在这样一个欧洲里,任何人都不反对别人,任何民族都不处于另一个民族的阴影之下,而是我们大家共同为和平的、自由的以及富裕的未来承担责任。

德、法关系一直是欧洲联合的核心力量。在德国统一之前,德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方面更多的是依靠法国的政治影响,在重大问题上与法国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并由法国牵头予以实施,自己甘当“配角”。现在,为了促进欧洲联合的进程,德国在继续保持“法德轴心”的同时,更多地显示德国在处理欧洲问题上的“主动性”和处于“主导地位”,不愿充当法国的“配角”。在德国统一前夕的9月18日,科尔总理就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举行了两国政府间的第56次会晤,双方决心在今后继续“作为欧洲联合的发动机”而起作用,共同努力促使讨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首脑会议的成功。

为促使欧洲在政治上的联合,科尔进行了多方面的外交活动。在1990年10月27日罗马举行的讨论欧洲联盟问题的欧共体特别理事会议上,科尔向欧共体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保证,无论是两个德国的统一,还是对东欧的财政援助,都不会使波恩放弃其在欧洲方面的承诺。1991年3月11日,科尔又与英国首相梅杰在波恩举行会晤,讨论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安全政策问题。科尔表示,德国不排除修改《基本法》而使德国军队在北约领土之外承担某些义务的可能性。梅杰认为,西欧联盟下的欧洲防务结构可能对北约和欧洲防务联系是一个妨碍;欧洲防务不能没有美国。梅杰表示,欧共体的不平衡是巨大的,不可能很快实现统一货币的目标;英国在某些问题上保留不同欧洲伙伴取得一致的权利。尽管英国在欧洲联合问题上有保留意见,但科尔仍不遗余力为欧洲联合奔波。1991年11月15日,德、法两国首脑在巴黎举行第50次会晤。两国领导人表示将继续努力,争取下个月在荷兰举行的欧共体首脑会议取得成功。双方一致认为,欧共体首脑会议必须为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内政和司法政策取得一致。为使欧共体成员国在欧洲政治联盟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或减少分歧,科尔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进行了多方面的外交磋商工作。

在德国的努力下,并根据德国和法国的建议,欧共体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12国政府首脑集会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于1991年12月

11日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1992年12月31日,迈向欧洲一体化重要一步的欧洲内部大市场正式成立。这个市场拥有12个成员国、3.45亿人口,在人员、商品、服务以及资本等四个方面实行自由往来,并取消了各成员国之间一切关税及贸易限制。欧洲大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购买力最强的市场。1993年1月1日欧洲大市场正式启动,标志着《罗马条约》所确定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目标的最终实现。1992年12月2日,德国联邦议院正式批准了《马约》。当《马约》被丹麦公民投票否决后,科尔表示德国决不能使欧洲联合的火车停使或减速,而要继续沿着欧洲一体化道路前进。在科尔的努力下,《马约》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①,“欧洲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简称“欧洲联盟”或“欧盟”)正式诞生。《马约》明确规定,欧盟是建立在共同体^②、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内政和司法三根支柱上。欧盟是欧洲15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它的成立标志着欧洲联合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统一欧洲货币,1994年1月1日建立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欧洲货币局开始运作。1995年3月26日,与欧洲大市场协调一致、取消边界检查、人员可自由往来的《申根协定》^③正式生效。为实现欧洲经货联盟,德国总理科尔和法国总统希拉克共同联手,顶住各自国内的压力,严格按照《马约》的规定,坚决制定严厉的预算措施,并推动各成员国逐一达标,终于使欧洲统一货币的计划得以启动。1999年1月1日,欧洲统一货币“欧元”正式问世,首先入围欧元区的有法国、德国、卢森堡、比利时、荷兰、芬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和爱尔兰等11国^④。欧元的诞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至此,科尔所追求的欧洲统一的经济政治目标已开始实现。

德国是欧洲联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为联盟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提供了巨额资金。欧洲一体化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统一货币的实现,也无疑为德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二

德国在统一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内部面临政治和经济上的整合,必须集中精力解决统一后出现的各种内部问题。同时,德国的邻邦对德国统一的疑虑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外交上还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随着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欧洲和世界的政治格

局出现了新的分化和重组的趋势,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善于捕捉机遇的科尔,及时抓住这一变化的世界局势,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断拓展新德国的外交空间,逐渐改变以往在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追随者”形象,推行全方位“自主性”的大国外交,努力争取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从1991年底开始,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开展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活动。

率先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是德国开始自主性外交的重要一步。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乘机要求独立,美国及欧共体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均不赞成。然而,德国为了重建其传统的势力范围,在不顾当时联合国秘书长的劝阻、不顾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反对的情况下,于1991年12月23日单独宣布承认这两个自治共和国的独立。这种德国率先行动、欧共体其他国家及美国不得不紧跟其后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的不协调的尴尬局面的出现,表明德国已经开始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推行自主性的外交政策,向国际社会显示统一后的德国的地位和力量。

要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是德国在外交上的又一个重大行动。德国要成为政治上的大国就要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从1992年7月开始,德国政界纷纷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德国应该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德国外长金克尔于1992年8月23日对《星期日世界报》记者说:“既然东京在争取席位,那么我们也要参与这一讨论”,“目前安理会的构成情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再能反映世界形势”^⑤。为此,德国在1993年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6月底,科尔总理亲自签署了德国向联合国总部递交的要求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申请书;7月,科尔和金克尔访问日本。金克尔声称,德国和日本将协调行动,努力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随后,德国利用一切场合大造联合国安理会应该进行改革的舆论,宣称欧洲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并成为联合国第三大捐款国的德国^⑥,完全应该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尽管德国这一外交努力还没有成功,但表明德国在统一之后欲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愿望是多么的迫切!

德国推行全方位的自主性外交还表现在一改以前向美国一边倒的倾向,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的同时,推行温和的外交政策,与俄国及东欧国家均发展友好关系。

德国积极谋求与俄罗斯建立友好伙伴关系。前

苏联戈尔巴乔夫对德国的统一曾给予大力支持,西方舆论称戈尔巴乔夫为“德国统一之父”,德国对此十分感激。苏联解体之前,德国就欲与苏联建立伙伴关系,并在统一之初就与苏联签订了《建立睦邻、伙伴和合作关系条约》。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成为其合法的继承者。德国欲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欲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必须得到俄罗斯的支持;德国与东欧各国改善和发展友好关系,扩大德国的势力范围,也必须得到俄罗斯的谅解和支持。德国支持俄罗斯建立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政治上的稳定,从根本上有利于德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有鉴于此,德国不顾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对,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伙伴关系,率先给予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援助。在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后,科尔于1992年12月14日访问了莫斯科,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八项协议。协议规定:俄罗斯军队比原规定提前半年、即在1994年8月31日前从德国领土上撤军,为此,德国将追加5.5亿马克的援助,作为俄军人撤回国内建房的费用;德国同意俄国延长8年偿还原苏联欠原民主德国的176亿马克的债务;德国决定向前法西斯德国暴行的受害者提供10亿马克的赔偿。德国政府为资助俄罗斯部队撤出德国的经费总共达146亿马克。科尔总理和其他政界要人多次公开发表谈话和声明,大力支持叶利钦的改革。科尔在1993年3月15日发表的一项书面声明中说:“叶利钦及其政府所进行的改革政策,不仅符合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对德国也有利。因此,我明确支持这一政策。”为支持前苏联改革,德国提供了800多亿马克的援助,几乎是整个西方对该地区援助总额的一半。至1997年底,德国对原苏联地区提供的援助共有1300亿马克。德国还大力支持叶利钦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科尔极力说服美国要“尊重俄罗斯的情绪”。

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德国一直以“东西欧的桥梁自居”,积极主张“东进”,与东欧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大力支持东欧国家的改革,充当联接东、西欧的桥梁和纽带。东欧一系列国家政治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新情况,为德国这一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首先,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不复存在了,东欧国家失去了“盟主”,出现了战后以来从未有过的实力真空。其次,这些东欧国家剧变之后,社会性质发生了演变,与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壁垒被打破,也逐渐倒向西方。同时,

这些国家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之中,既缺乏改革的经验,又缺少资金和技术,急需西方国家尤其是邻国德国的支援和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对东欧各国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攻势,急欲填补这一真空地带。为了积极支持东欧国家转轨的改革,德国政府于1993年专门设立了只面向东欧国家的“体制转轨咨询计划”,每年从联邦政府预算中拨出专款,保证咨询项目的实施,至1998年初,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项目有5000多个。德国的目的是要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运作体制和健全的司法制度,逐渐达到加入欧盟的标准,为最终克服欧洲的分裂做出贡献。如同对俄罗斯慷慨解囊一样,德国对东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各项援助。至1997年底,德国对东欧国家的援助在600亿马克左右。除经援之外,德国还积极扩大对东欧的直接投资。1989年至1995年,德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总额达127.5亿马克,相当于该地区外来投资总额的23%。德国还通过与东欧国家签订双边条约,通过条约解决诸如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以消除这些国家对德国统一之后的疑惧心理。如1991年6月17日,德国和波兰签署了《德波睦邻和友好、合作条约》,确定了两国边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1997年1月21日,德国总理科尔和捷克总理克劳斯签署了《德捷和解协定》,两国笑泯历史仇怨,实现了和解。科尔总理还极力促使北约和原华约成员国共同组建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加强东、西欧在安全方面建立紧密的联系与合作。德国这些外交努力,使其这一新的东方政策赢得了东欧各国对德国的友好和信任,德国与东欧国家的交往因而十分频繁。

同时,德国也积极主张北约和欧盟东扩,因为德国不想再做西方的东部边界。北约东扩后,军事上将使德国从原来的前线国家变为后方国家,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国防开支;经济上德国唾手可得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因为如此,外长金克尔就指出:“德国在重新统一后又地处欧洲中心和也考虑到自己的过去一对要求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只是由于害怕过多地触怒俄罗斯,并考虑俄罗斯的情绪,德国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态度一度有所缓和,对北约东扩持谨慎态度。在1994年1月北约作出东扩的政治决定后,原本积极主张北约东扩的科尔在1995年表示,北约组织不应该因接纳东欧国家和不必要地触怒俄罗斯而在欧洲建立起“新的高墙”。科尔主张北约东扩应与欧盟向东扩展“同步进行”。因为东欧国家目前加入欧盟是不可能的,科尔的主张

实际上意味着要放慢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速度^⑦。

德国意识到,在世界多极格局中,具有一定实力的大国在全球展开了以经济和科技为主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并力图在多极化的格局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这一局势对经济科技实力强大的德国具有很大诱惑力。意欲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并要求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德国,其外交不能仅仅只局限于欧洲一隅,必须向其他地区拓展,这是德国在政治上的需要。

科尔曾说过,在政治领域同亚洲的合作早已是德国全球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亚洲国家由于在世界政治中的份量,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发展方面,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具有全球意义”。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亚洲经济却呈现出少有的活力,成为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尤其是亚洲潜在的大市场,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为了显示德国的大国地位和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德国认为必须“更多地参与亚洲事务”,参加与美国、日本之间的竞争,改变德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活动中落后于美、日的被动局面^⑧。为此,科尔政府在亚洲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1993年2月18日至3月3日,科尔对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5国进行了访问,密切了德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扩大了德国在亚洲的影响。这次亚洲5国之行,极大地开阔了科尔的视野,并第一次设计出了他的“亚洲新观念”,研究制定了“亚洲政策新方案”。德国的新亚洲政策将亚洲作为德国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强调要加强与亚洲的经济合作,重点增加德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把科技合作作为与亚洲合作的关键领域。随后,德国政府积极推动政企合作,促进德国企业进入亚洲。鉴于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亚洲和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德国要谋求常任理事国也需要中国的支持,以及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活力,德国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因此,科尔于1993年11月第二次亚洲之行时访问了中国,开始了正式实施德国的新亚洲政策。这是科尔作为统一后的德国总理第一次、也是他第三次对中国的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1996年11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也被频繁邀请访问德国。这些访问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推动了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

除此之外,德国还重视和积极扩大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的影响。

德国统一后在外交上的自主性倾向,使美国也认识到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美德关系出现了从过去的“主从”关系到“领导伙伴”关系的转变。1994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德国进行了访问,并发表了战后以来对德国进行“最为全面的支持性讲话”。他称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是美国欧洲政策的基石,德美关系是战略领导伙伴关系。国际舆论认为,克林顿这次对德国的访问宣告美德之间的“主仆”关系的结束,开始建立起新的“领导伙伴”关系。1995年2月,科尔总理对美国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回访。在会谈中,科尔与克林顿讨论了对俄政策、波黑冲突及北约东扩等问题,克林顿听取和接受了科尔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和看法,并一再称赞科尔是“当代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之一”^⑨。科尔这次访问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德国是美国的“领导伙伴”关系形象。在欧洲问题上,德国甚至不愿美国充当领导角色。科尔在1997年2月9日接受法国电视二台采访时说,在冷战结束后的形势下,美国已成为欧洲的伙伴,因此它不应当是指挥欧洲的“上级领导”。他说:“北约组织应当成为欧洲安全防务的轴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美国人唯命是从”。可见,德国反对美国在欧洲事务问题上指手画脚。在涉及德国内政外交问题上,德国更不愿美国颐指气使,也经常对美国说“不”。1997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要求德国政府不要不顾波黑难民的意愿,把他们一律遣返。德国立即对此作出了强烈反映,金克尔外长表示,美国无权规定我们应该做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不需要别人的指教。当然,德国在一些问题上对美国说“不”,并不意味着德国政策趋向反美,而是表示德国不再一味盲目追随美国,但在不少问题上它们的政策还是一致的。

三

为表明德国的政治大国地位以及爱好和平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诚意,德国一方面正视自己的历史,勇于承担在二战中的战争罪行。科尔在1995年5月6日发表的纪念二战的声明中指出:现在的德国人有2/3未经历过二战,因此应该用图片、电影、亲历者的叙述、日记和老一代的经历教育他们,使他们了解希特勒发动战争和纳粹暴政造成的严重后果;“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德国人一定要牢记这个教训”,不能无视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只有这样,过去的恐怖经历才不致重演。德国总统赫尔佐克也告诫说,不能忘记纳粹暴行,以免重蹈覆辙。德国政府不仅在道

义上勇于承认历史罪责,而且还承担了不少赔偿责任。在德国统一之前,联邦政府根据1953年的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法,每年要支付数十亿马克的赔偿费,在德国统一前已支付了800亿马克。统一后的1991年,德国政府向“德国波兰和解基金会”提供了一笔价值5亿马克的捐款,以表示对波兰受害者的赔偿;1993年4月,德国又向前苏联3个共和国一次性赔偿10亿马克;1996年12月28日,科尔表示德国愿意向纳粹受害者提供更多的经济补偿,认为这是尊重历史和不忘历史教训的具体行动,随后德国允诺提供1.3亿马克,以增加对法西斯集中营幸存的犹太人和纳粹受害者的后代等经济补偿。到本世纪末,德国赔偿总金额将达到1020亿马克。

同时另一方面,德国主动要求承担更多的维护和平的国际责任。德国在统一之后的政府声明中指出,德国愿意为世界的和平进步作出贡献,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承担与统一的德国的地位及声望相适应的责任与任务。愿意为世界和平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统一后的德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新动向。它表明,德国现在是一个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国家,并且完全摆脱了二战中四大盟国的制约,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中的平等一员,应该享有和履行大国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此扩大德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德国承担国际责任和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当然是从本国和西方国家战略利益考虑的,是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立场上。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当联合国对南斯拉夫实施贸易和外交制裁的757号决议通过后,德国率先对南斯拉夫实施制裁,决定从1991年12月10日起解除与南斯拉夫签订的所有交通协定。1992年8月8日,科尔对《星期日世界报》发表谈话表示,要求对南斯拉夫战乱地区实行军事干预,以保障向那里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尽管如此,由于德国法西斯曾占领过南斯拉夫这一历史原因,德国决定不派军队参加在南斯拉夫地区的任何维和行动。海湾战争爆发后,德国就表示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占是不能接受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德国一方面希望和平解决海湾危机,另一方面表示要坚持原则立场,认为侵略行为是不能受到鼓励。当美国表示要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后,科尔在1990年9月15日会见美国国务卿贝克时宣布,联邦德国政府将提供总额为33亿马克的援助,支持美国在海湾的军事行动和资助受海湾战争影响最深的国家;另外,德国还将征用民用飞机和船只供美国在海湾调兵,并提供车辆、通讯器材及60辆先进的

“狐”式毒气侦察装甲车供海湾战争使用;还对欧共体国家提供42亿马克的援助;对于因受对伊拉克制裁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国家提供直接的财政援助^⑨。只是由于受《基本法》的限制,德国军队不能派往北约以外的地区发挥作用,所以德国没有表示向海湾派兵。1991年1月7日海湾战争正式爆发后,德国对海湾战争进行了有限的介入。在战争爆发前的1月2日,科尔政府就决定,德国将在6日至10日派遣18架阿尔法型喷气式战斗机参加北约机动干预部队前往土耳其。德国政府声明,德国派遣这些飞机的目的是起威慑作用,以阻止别国对北约的进攻,这是符合《基本法》的规定。自海湾危机以来,德国已向美国及有关国家提供了140亿马克的资金援助,在海湾战场外围部署的德国军队达1500人。对此,科尔声称,德国士兵只能参加保卫北约领土的行动,不派士兵参加海湾战斗;德国的军事人员都部署在战场的外围,多属象征意义;德国的战斗机只起威慑作用,不是为了参加进攻。这些都表明,德国为了显示其政治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对海湾危机必须介入,决不能袖手旁观。然而,由于受《基本法》的制约,德国对海湾危机的介入又只能是有限度的。

1992年2月,科尔在同德国《商报》和《欧洲华尔街日报》记者发表全面阐述德国的国际责任问题的谈话中强调,德国人有义务去承担起自己的国际责任,并主张在本立法期内就要阐明这一基本原则问题,以便联邦德国为维护 and 重新创造世界和平而全面参与联合国的行动能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基础。科尔在1993年2月17日回答日本记者关于德国的国际责任问题时说:我们是联合国成员,作为会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1990年10月德国统一之前,我们国家是分裂的,因此不能完全履行我们的国际责任,现在不能这么说了,我们今天不能躲避国际责任。科尔指出,关于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派遣德国军队参加维护和平的国际行动;第二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

向境外派遣德国军队涉及到要修改德国《基本法》。《基本法》明确规定联邦德国军队为防御而建立,对向境外派出联邦军队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此,在德国统一之前的历届政府都没有派兵参加境外的任何军事行动。德国要想在世界上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其联邦军队就不能只局限在北约的防御圈内,应与其他大国一样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用科尔的话说,德国是即将成立的欧洲政治联盟的一部分,如果“认为我们不去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就能成为欧洲政

治联盟的一部分的想法,则是荒谬的”;“如果我们不全面参与欧洲政治联盟范围内的各种活动”,“那就是我们虽然享受了权利,但却不能充分履行我们应该履行的义务,我们的朋友和伙伴将不会接受这种状况”。为使德国向境外派遣军队合法化,科尔极力主张修改《基本法》。然而,在是否修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问题上,德国国内各派势力、尤其是执政联盟和反对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一时未能定夺。科尔将此问题的争执搁置一边,通过宪法之外的途径使德国军队合法的走出国境。1993年4月8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同意联邦国防军参加联合国在波黑的禁飞行动。紧接着的4月21日,德国联邦议院经过激烈的辩论,以341票同意、206票反对、8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科尔提出的出兵索马里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德国于7月21日派出了1640人的部队飞往索马里,以援助联合国为重建索马里的行动。这是德国自二战以来向境外派出的第一支维和部队。1994年7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再次作出裁决,必须经过议会批准,德国军队可以在北约和西欧联盟的范围内参加旨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的行动,同样可以参加联合国组建的维持和平部队。同时,联邦议院又召开特别会议,批准了德国已经正在境外进行的维和行动。至此,德国在不对《基本法》进行任何修改的情况下,通过符合全部法律的程序实现了与其他西方大国一样派军队到境外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目的。

在此之后,德国朝野对派军队到境外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基本上达成了一致的认识。如在1995年6月30日召开的联邦议院会议上,在没有像以前那样进行激烈争论的情况下,以386票赞成、258票反对、11票弃权的较大多数,通过了科尔政府于6月26日提出的派遣作战部队和卫生部队参加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维和行动的议案。在这一议案通过之后,为了支援英、法、荷三国快速反应部队和联合国蓝盔部队的维和行动,德国迅速地于7月17日将第一批德国士兵和军用物资运送到意大利的皮亚琴察基地,第一批“旋风式”战斗机也于7月20日飞抵该基地。德国这次出兵的特点是反应十分迅速,并带着作战的任务,因而与以往不一样,其“军事性质”加强了。而在1999年3月24日开始的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则是在没有联合国授权情况下的侵略性军事行动。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德国自始至终参加了对南联盟的轰炸,并在战争结束后作为北约部队成员向科索沃派遣8500人的德国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

动。这些都表明德国已开始将过去只是一般性参与国际维和的行动,发展到从军事上参加北约的作战行动和介入联合国的维和军事行动,开始以军事方式显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并通过在国际上扩大其军事力量的影响达到实现政治大国的目的,彻底改变其“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形象。

注 释:

- ① 由于《马约》的一些规定无法适应欧洲变化的形势,在其生效后不到两年就开始进行修改。1997年10月2日,欧盟15个成员国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签订了《阿姆斯特丹条约》(简称《阿约》)。此条约是在对《马约》进行修改后形成的,对欧盟自身建设及就业和社会领域问题奠定了新的法律基础,在司法和内部安全方面较《马约》前进了一步,在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方面表明了政治意愿,明确规划出21世纪欧洲建设的蓝图,是欧洲一体化新的进步。《阿约》是继《罗马条约》、《马约》之后的第三个欧洲一体化条约,1999年5月1日正式生效。
- ② 此共同体是指50年代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Montanunion)、“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äische Wirtschaftsgemeinschaft)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opäische Atomenergie-Gemeinschaft),这三个共同体统称欧洲共同体。
- ③ 1985年6月14日,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5国在卢森堡小镇申根签署了《关于逐步取消共同边界检查的协定》,称为《申根协定》。此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奥地利也先后加入了这一协定。由于各方

面的原因,《申根协定》一直未能如期生效。1994年12月22日,《申根协定》委员会波恩会议决定,1995年3月26日为协定“不可逆转的最后生效日”。

- ④ 英国、丹麦和瑞典暂时不想加入欧元区,希腊尚未达到《马约》规定的入围标准。
- ⑤ 引自朱忠武《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306页。
- ⑥ 德国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承担了联合国费用的8.9%,在交纳会费的国家中排位第三。
- ⑦ 由于美国要继续掌握欧洲安全的主导权和遏制俄罗斯东山再起,欧洲一些国家也出于欧洲安全及要继续维持大西洋两岸联系的纽带的考虑,都决定选择包括北约东扩在内的改革道路。1999年3月12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密苏里州独立城举行仪式,正式接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其新成员国。这样,北约成员国由原来的16个扩大到19个。
- ⑧ 1992年,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为3474亿美元;日本为1937亿美元,占其全部外贸额的33.8%;而德国与亚洲国家的外贸出口额1986年仅为368亿美元,占其全部外贸额的8.48%,至1992年仅增加不到2%,为10.38%。1993年,德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只有美国的1/9,只及日本的1/14。
- ⑨ 引自萧汉森、黄正柏主编《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
- ⑩ 德国表示给埃及提供9.75亿马克,给约旦提供2亿马克,给土耳其提供1.1亿马克。

(责任编辑 张琳)

On German Active and All-sided Diplomacy After Reunion

Wu Youfa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uthor: Wu Youfa(1948-),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stories of modern Germany and WW II.

Abstract: Germany since reunion has become a powerful state in Europe, casting off the position of a defeated state and control by the 4-State Union headed by USA and USSR. Germany reunion and USSR's disunion ended the cold-war between USA and USSR.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European powers. The world situation develops towards the multipolar.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German position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Germany gave up the images of followers, and it upholds the active and all-sided diplomacy, develops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world, becomes a powerful political state, and also actively asks for carrying more international duties.

Key words: Germany after reunion; active diplomacy; all-sided diplomacy